

国宝安家！

子弹库帛书：流落海外79年

■5月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“子弹库帛书”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抵达北京，并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。

■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，1946年流失至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唯一出土的战国帛书，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，对于古文字、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
■子弹库帛书一共三卷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，内容主要为与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华盛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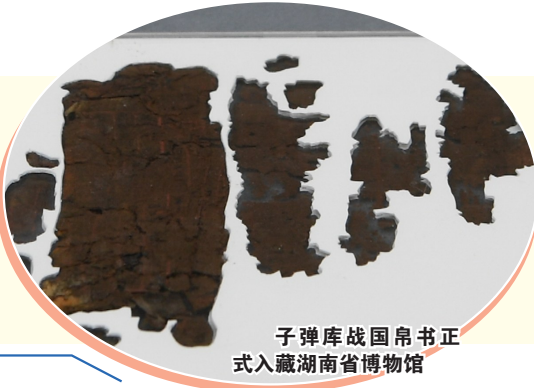
■从出土到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故土，子弹库帛书颠沛流离的历史，既是动荡岁月的写照，也是世道人心的见证。

10月13日上午，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、三卷《五行令》与《攻守占》划拨入藏仪式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，标志着流失海外79载的瑰宝正式回归故土、入藏湖南省博物馆。

子弹库战国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、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帛书，于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

遭盗掘出土，1946年流散海外。通过中美文物返还合作，今年5月18日，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落地北京，回到祖国。

如今，国家文物局将其正式划拨至湖南省博物馆并入藏，文物完成从流失到回归、从归国到归乡的历程。



子弹库战国帛书正片入藏湖南省博物馆

2

1944年4月，日寇进攻长沙，蔡季襄举家逃难，帛书则用一个铁筒装好随身携带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屠杀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黄菲莲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。

侥幸逃到湖南安化安顿下来的蔡季襄，哀伤妻女之际，将所带赠书“爱加董理，釐定次序，附以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赠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、测绘和研究子弹库帛书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所有研究的起点。

1945年抗战胜利，蔡季襄回到长沙，但已是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窘困。蔡季襄为生活所迫，想起上海最大的古董店金才记古玩店还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赠书上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到大城市用红外线摄影将字迹照出来。于是1946年夏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

此时美国情报人员柯强(John Hadley Cox)受派遣来华，住在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学会派遣到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，其间即广泛搜求中国古文物，更一度因与蔡季襄争

购而引来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柯强回国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“长沙出土文物展”。

蔡季襄托金才记店主金从怡帮他找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照相馆，金从怡满口答应，却将此事告诉了柯强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下，蔡季襄带上赠书到了柯强的住所。

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，“但我有个朋友也是研究红外线摄影的，器材比我还好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一起拍，无论如何保证明天可以把照片拍好。”也许是求字迹心切，蔡季襄将赠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

第二天到了柯强住处，柯强却说：“昨晚拍了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来辞行，我就托他带到美国拍摄去了，大约一周之内就能把赠书和照片一并寄回。”蔡季襄坚决不同意，要柯强立刻退还赠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作担保金，先付一千为定。

面对柯强的要无赖和傅佩鹤的软硬兼施，无奈的蔡季襄与柯强签订了契约。之

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蔡季襄和女儿女婿

后每隔两三天，蔡就去催问一次，柯强总说照片难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总会寄回来”。终于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襄只能悻悻返湘。

之后蔡季襄又托柯强曾经的学生、赴美留学的吴柱存去与柯强交涉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赠书。

1980年1月，蔡季襄去世。同年年底，舒尔特斯也在美国去世。他是把子弹库帛书带到美国的人。



《四时令》的文字以四方顺序排列，象征四季流转

1

长沙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“东南之会”、西汉时期历时两百余年的长沙国国都，无论楚墓还是汉墓都众多，也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之地。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重要战场，众多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

任全生是当时长沙比较有名的盗墓贼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很快便声名鹊起。1942年9月某晚，任全生带着漆效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等人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方，用15米长的探针凿穿一处古墓的封土和木棺椁层，从墓中盗得铜器、陶器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

任全生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眼里，除去金银珠宝只有铜器、木器能值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处理给了外号“唐裁缝”的古玩店老板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烂丝织品没算钱，相当于送给他”。任全生几十年后才知道：当时他看不上的这些烂丝织品，比其他物品加在一起的拍卖价都要高得多。

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考古学家商承祚求售，双方正在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长沙人的文物专家蔡季襄于1943年冬由上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以3000元法币从唐鉴泉手中买下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著名藏书家叶德辉的亲戚，从小受教于叶。他用毛笔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除去，再请来一位裱糊名匠装裱。裱好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。

其余的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。当时这样的丝质文字称为“赠书”，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后，“帛书”的称谓逐渐取而代之。



柯强在长沙的古墓盗洞前

3

舒尔特斯是柯强的上级，他受柯强之托，将帛书带到了位于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·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帛书后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》借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存期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借存于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。

1964年4月10日，柯强取出存放到期的《四时令》，将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戴福保。两年后，《四时令》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戴卖给了阿瑟·塞克勒。

阿瑟·塞克勒发迹源于创新地使用新式广告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直销广告上饱和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注意力。现代医药广告的诞生即始于他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·塞克勒、莫蒂默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

挣得盆满钵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艺术爱好买单的，是生产著名的安眠药“安定”。

1967年，阿瑟·塞克勒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了一次关于子弹库帛书的研讨会。这是子弹库帛书出土后第一次向世人亮相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。

此时的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。1971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被发现后，为了积累经验发掘二号墓和三号墓，在当时已成为湖南省博物馆员工的任全生指引下，于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，并新发现一幅人物御龙帛画。郭沫若闻讯非常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。

郭沫若也是阿瑟·塞克勒想见的人。1978年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来华时就希望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直接谈

送还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郭氏当时病情严重而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写道：“它(帛书)是我最重要的藏品……我一直希望这件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，由一个美国人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我国人民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……”

但阿瑟·塞克勒也没等到这一天。1987年5月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幕，《四时令》从此存放于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及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匿名捐献的名义入藏同一美术馆。

由阿瑟·塞克勒而始的艺术捐赠事业，在他死后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、大都会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美术馆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，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或捐赠致谢。

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·塞克勒的侄子理查德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地用在了1996年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：超700万人服药后上瘾，超20万人死于过度用药，受害者包括《老友记》里饰演钱德勒的马修·派瑞。

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撇清关系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为如今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。

柯强于2005年死亡。他从中国返美后受精神错乱的折磨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。

本报综合消息